

第一章 20 世纪的世界七大国： 世纪始末

罗伯特·A. 帕斯特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人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巴尔干半岛上的一场战争使西欧和美国成了塞尔维亚人和他们俄国朋友的敌人。人们感觉，这场战争并不陌生。其实 20 世纪的每一位公民一生中都看到过巴尔干半岛上的一次冲突。但每个人均从自己一代人痛苦经历的视角对现在的这次冲突作出不同的解释。

对有些人来说，巴尔干半岛的冲突仿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演的慢镜头。旧帝国把新帝国拖入深渊，而它们对产生冲突的当地根源及其全球性的后果却一无所知。一些世界观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人认为，北约介入是为了捍卫西方的价值观。最后，还有人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陷入四分五裂的原因是“文明的冲突”——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争。在他们眼里，各民族之间互相厮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

然而以上的三种解释没有一种能准确地揭示最近科索沃危机的实质。它不是一场帝国之间的战争。这一次美国没有像 1914 年那样躲避冲突，而是领导了西方。成立北约是为了阻止

或预防苏联称霸欧洲，可今天苏联已荡然无存。最后，西欧并没有去打科索沃的穆斯林，而是保护他们。本世纪巴尔干半岛上的历次冲突只有一点相通——同样的野蛮。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正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样，人类目睹了大国的兴衰和帝国的解体。20 世纪行将结束时与此前所有世纪不同的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不再有帝国和殖民地。七大国通过谈判制定出规则，并毫无例外地受到这些规则的束缚。它们不去攫取其他国家的土地。它们通过国际组织，而不是炮舰寻求自己的利益。它们都签署了申明惟一一套人权准则的诸项条约。事实上，七大国中的大多数国家正是出于以上人道主义的考虑才卷入了科索沃的战争。它们更重视打开市场，而不是确保得到资源。它们花在社会保险上的钱超过购买武器的开支。它们劝说交战的民族讲和。欧洲的三强寻求彼此间的和谐一致，而不是结成敌对的同盟，彼此兵戎相见。之所以有这些变化，是因为大国在世纪末追求的目标不同于世纪初追求的目标。新的目标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列强”这一概念应该说是 19 世纪的产物。当时世界上的帝王君主拥有帝国。他们派遣雇佣军控制海外领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尔虞我诈。1901 年，英国在位最久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下葬时，世界各国的君主云集伦敦出席葬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沾亲带故，如德国的恺撒·威廉二世和俄国的尼古拉二世是女王的侄子。然而就在 3 年前，威廉决定建立一支比英国舰队更强大的舰队。7 年前，尼古拉同意与法国秘密结盟，以遏制德国。以上决定均是一个人不经过公开辩论独断专行的结果。每一项这样的决定都是朝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迈出的又一步。

维多利亚女王和同时代的其他君主一样，是帝国主义体系的坚定支持者。不过她在英国受人爱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认识到一个君主再也无法统治大英帝国。她于是把自己的作用减到扮演象征性的角色，国家由民选的领导人去治理。所以英国王室的显赫虚多实少。但在德国、俄国、日本、土耳其和奥匈帝国，执政的仍然是君主。他们占有的殖民地和侵吞的他国领土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特色。

今天，七大国的国家领导人均是经过民选产生的，而不是君主。合法的权力不是神授的，也不是靠赤裸裸的威胁，而是源于人民的同意。这几乎成为一项普遍原则。世界上大约有一分之一的政府不实行这项原则，但它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全拒绝这一原则。

七大国中没有一个称霸世界。不过在联合国的 185 个会员国中，七大国占了世界贸易额的一半，世界产出的三分之二和世界国防开支的将近四分之三。七大国对远离本国的地区施加影响或作出反应的能力仍然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它们仍然塑造着世界，但做法上要比本世纪初时迂回隐蔽得多。七大国的首要目标是促进本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七大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一个促进贸易和投资、遏制并设法解决冲突的国际体系。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然而在政治和经济目标优先的领域，超级大国的地位已不如一百年前那样重要。一百年前，列强忙于瓜分世界。美国的实力实际上既源于它的财富和武器，也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建立的各种机构。

由于七大国的目标起了变化，它们追求这些目标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军事和经济实力与 1900 年时的概念简直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别不仅改变了打仗或避免战争的方式，而且“实

力”概念本身和国际政治游戏也发生了变化。举例来说：

- 今天的一艘核潜艇的火力超过了 1900 年时世界各国军队拥有的火力总和。然而拥有世界核武器 93% 的美国和苏联在昂贵的区域战争中却输给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 世界最大的 100 个经济体中,51 个是公司,49 个是国家。其中的一个公司——通用汽车公司——1997 年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几乎是 1900 年整个欧洲商品和劳务的总和。¹
- 一条光导纤维电缆一分钟传递的信息量超过了 1900 年世界电报和邮政系统一年传递的信息量。电视把世界上的每一场冲突带进数十亿人的客厅里。但大多数人更关心物价，而不是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暴力。

有些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是新的。但世界七大国并没有变化。20 世纪初,三个国家——美、日、德——走出孤立状态或克服了国内的分裂,对 19 世纪的列强提出挑战。日本和德国在 20 世纪中的一场战争中被打败。但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美、日、德三国再次势压群雄。21 世纪来临之际,美国、日本和德国——按此顺序排列——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最高的军费开支。法国和英国已经从 1900 年时的帝国巅峰上滑落。但考虑到它们的经济、军队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两国仍然称得上是七大国中的两强。俄国和中国的国运在本世纪里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尽管如此,俄国和中国仍然是大国。因为它们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且对世界局势有着影响。

本书的论点是 国家* 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角。然而它们决定自己目标的方式以及它们追求自己目标的外部环境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虽然不是彻底的变化。世界各国仍在互相竞争，但今天的游戏不同于 1900 年对殖民地的争夺。如今它们追求的是社会和经济目标。为此国与国之间需要相互合作并遵守国际规则。各国对安全的关切有所减轻，但并没有因此高枕无忧。每一个大国可以自由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若要把握 21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或繁荣与萧条的前景，就不能不知晓七大国如何以及为什么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并改变了世界体系。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新旧世纪之交时，信奉一套崭新原则的美国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原则几乎把旧的国际体系搅了个天翻地覆。倘若这些原则没有美国的实力做后盾的话，它们是不会实现的。倘若美国显示武力时没有这些原则作为依据，它可能会取代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者，但不会结束帝国主义的体系。

核时代的前夜，爱因斯坦曾感慨道，一切都变了，只有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变。同样，我们对外交政策的认识也没有针对过去一百年的历程作出调整。我们仍然担心会出现“另一次慕尼黑”或“另一个越南”。然而未来的威胁与过去的惨痛经

* 这里的国家 (state) 一词常常与“nation”和“country”互用。三个词有联系，但各不相同。“state”是一个政治单位，是国际体系中的主体。它包括一国人民、领土和权力机构。“nation”指有着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一个群体。“country”指一国的疆土。苏联是一个由多民族 (nation) 组成的政治意义和地理意义上的国家 (a state and a country)。关于这几个词的区别，参见 Lowell W. Barringt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The Misuse of Key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December 1997), pp. 712 - 716。

历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借古喻今有时会模糊我们的视线，从而看不到新的机会。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对当今政治格局的一些新看法。权且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新绘制的地图吧。

冷战后时代的 6 幅地图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令人感到极其迷惘。有些领导人不禁怀念起昔日的两极世界。当时无论发生什么事，皆可从美苏孰得孰失的角度得到解释。由于当今世界不再划分为东西方或南北方，学者和决策人不得不寻找认识世界的新途径。有一派理论认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和恐龙时代一样已成为历史。形同化石的民族国家应该从 21 世纪的地图上抹掉。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解释。下面我综述一下 6 种最具影响的观点。

1. 全球化论。技术和通讯手段的日新月异加上跨国公司的日益强大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作用。凯尼奇·奥马称这一“不可逆转的”过程将导致“一个真正的没有国境的经济体系”并将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²
2. 文明冲突论。新的国际秩序的特征是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全球一体化。亨廷顿列举了九大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和日本文明。他认为：“诸文明之间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经济一体化不会抹掉以上诸文化的特点。这些文化将继续保持自己的特征而且彼此不可调和。³

3. 世界新秩序论。超级大国的争夺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得以发挥联合国缔造者当年为它设想的作用：采取“集体措施预防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并鼓励对人权的尊重。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联合国联盟标志着“世界新秩序”的诞生。⁴它的诞生十分及时，因为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有效地对付跨国界问题的能力。只有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才能解决诸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金融动荡、难民大批外流和种族灭绝之类的难题。⁵
4. 民主和平论。世界政治取决于国内政治。和平依赖于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和民主政权的普及。民主国家彼此不打仗，至少民主得到巩固后的国家不打仗。因此，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或独裁政权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⁶
5. 泛区域化论。技术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自从 1947 年以来，诸项国际协议拆除了大部分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然而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三个欧洲、北美和东亚。每一个泛区域内的贸易额比各区域之间的贸易额增长要快得多。三个区域各以一强为首。欧洲联盟（欧盟）是德国。北美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美国。东亚是日本。但日本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中国的挑战。图 1.1 表明，世界产出和贸易量的 80% 来自这三个地区。⁷
6. 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角。和历史上的大国一样，七大国更能够影响国际体系的性质并制定国际规则。但在广泛适用这些规则的国际组织里，所有主权国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参与表决。

以上的每一幅世界地图均强调了某些特征而遗漏了其他特征。全球化理论突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及产品，趣味，甚至观点的日益趋同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产出增长速度的三倍。⁸ 实现这一增长的主要工具是跨国企业，如福特公司、迪斯尼公司或壳牌石油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遍及许多国家。今天，世界工业产值和贸易额的将近一半出自不过几千家跨国公司。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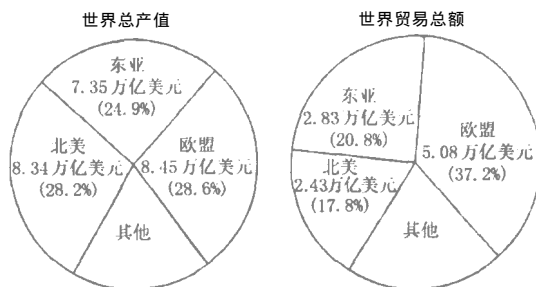


图 1.1 世界三大地区：1996 年指标

注 总贸易额即商品和劳务进出口总额。北美：加拿大、墨西哥、美国（总人口 3.88 亿）。欧洲联盟：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总人口 3.77 亿）。东亚：文莱、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总人口 17.2 亿）。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8)。

从全球化入手思考当今世界是很自然的事。国与国之间商品、劳务、技术和资本的迅速流动把各国拴在一起，迫使一国人民、公司和政府要么调整自己，参与竞争，要么落在别人的后面。¹⁰ 面对全球竞争，公司被迫加强专业化程度。消费者于是有了更多的选择。产品质量越来越好，要么是价格越来越低。

全球化的消极面是，各国为越来越依赖外国公司而付出代价。一国若想用外国资本补充本国的国内储蓄的话，就必须平衡预算，保持本国货币的稳定。如果它不这样做，外国资本就会

像流入那样快地流出。外国资本流走后，凭借外国资本发展起来的经济可以顷刻间垮掉。1994 年 12 月和 1997 年 7 月墨西哥和东亚国家分别认识到了这一点。市场法则一向铁面无情。然而当今货币流量之大以及流入流出速度之快却是前所未有的。

1971 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雷蒙德·弗农写道 跨国公司为改善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它们“限制了主权”，因为跨国公司“不对任何管辖范围可以与之相比的公共机构负责”¹¹。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迫使各国政府彼此竞争，通过税收上的刺激手段和廉价劳动力吸引有限的外国投资，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的力量。然而事实表明，主权国家并没有受到削弱或威胁。自从 1960 年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几乎增长了 3 倍 达到目前的 50% 左右。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翻了一番 达到大约 28%。换言之，相对各自的经济规模而言，富裕国家政府的规模是较穷国家的约两倍，而且增长速度超过后者。政府开支中用于老年人或残疾人的转移支付越来越多。全球化也许使世界变得更小，但各国政府的规模却在增加，而且努力满足本国人民多方面的需要。¹²

各国减少了贸易壁垒，从而促进了全球的一体化。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们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弗农认为，90 年代跨国公司带来的问题不是它们威胁了一国的主权，而是各国对跨国公司施加种种限制，因而损害了世界人民的福祉。¹³

全球趋同化常常引发一些群体或国家的强烈反应。他们感到受到排挤或剥夺，担心失业或失去做人的尊严。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并不平坦。每拆除一个贸易壁垒，公司就多一分威胁。要求实行保护主义的呼声因此日增。通过电影和有线新闻电视

网传播的美国通俗文化引起了原教旨主义者、民族沙文主义者乃至普通百姓的强烈反感。他们担心丧失自主权。¹⁴

亨廷顿的观点——即当今世界分野的新特征是各种截然不同、不可调和的文明之间的争斗——加深了我们对全球化和美国强大实力引起的反响的文化根源的认识。他对伊斯兰世界观的解释尤其精辟。然而人们对他强调国际政治中文化冲突的重要性不禁产生怀疑。本世纪发生的最可怖的冲突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同一文明内的冲突。20 世纪世界最野蛮的战争中的两场发生在亨廷顿称之为的“西方”文明内。随着冷战重要性的减低，伊斯兰世界内爆发了一场最惨烈的冲突——两伊战争。冷战结束后的头 10 年里，最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发生在非洲文明内——卢旺达和布隆迪。宗教是构成“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就战争的惨烈程度与死亡人数而言，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东征简直无法与天主教与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战争相比。

世界新秩序论有好几种，有的已是老生常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数十个国家摆脱了贫困，扩大了全球贸易，避免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和萧条。同时还涌现出了其他的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组织，致力于保护人权、铲除疾病、促进发展、调解冲突和鼓励裁军。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是否已完全松绑，可以充分发挥罗斯福总统当年希望它发挥的作用呢？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互相牵制，防止对方利用联合国谋取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了联合国的瘫痪。毫无疑问，超级大国争夺的结束使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在世界的许多冲突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48 年以来安理会进行的 49 次维和行动中，36 次是在冷战结束后的 10 年内批

准的，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整个联合国体系重新焕发了活力。诸如国际刑事法院等新机构的成立会增加诞生一个世界政府的可能性。¹⁵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国际机构是重要的成员。国际机构遵守的条约赋予缔约国义务并对它们加以约束。取代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对增加贸易壁垒的国家实行制裁。欧盟负责监督 15 个成员国遵守多如牛毛的协议，以确保贸易、资本和劳工的自由流动。然而联合国和区域组织预防战争、缔造和平的努力，尤其是在一国国内，要比其姐妹组织减少关税的努力困难得多。在经历了伊拉克、安哥拉、波黑和塞拉里昂的一系列挫折后，一位人士写道：“10 年前苏联解体时，人们曾满怀信心地预料，会诞生一个新型的、更理智的世界秩序。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里，我们连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国际组织——不管是联合国、北约，还是西非国家的维和组织——似乎显得束手无策。”¹⁶ 以上挫折应该提醒我们，不要把工具错当成技工。只有七大国选择合作时，国际组织才能对付一场危机，比如海湾战争。七大国认为它们各自的利益不一致时，联合国安理会的门就是紧闭的。

在加强还是限制联合国的问题上，美国一向左右摇摆。毫不奇怪，它在任何特定时间采取什么立场取决于一项具体行动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使是海湾战争，布什总统决定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时，也没有征求联合国的意见。他先作出决断，而后再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1994 年 7 月克林顿总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恢复海地立宪政府的决议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通过这项决议不是为了加强联合国，而是为了支持美国的一项倡议。在科索沃问题上，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北约决定不经联合国授权，开始轰炸塞尔维亚。简而言之，世界新

秩序与旧秩序有相似之处。

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彼此间不打仗的论点）认为，当今世界主要划分为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大量的论著探讨并进一步修正了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它又有了新的延伸。例如，新生的脆弱民主政权也许比独裁政权¹⁷更好战；群众基础薄弱的民主政权也许会与广泛群众基础的民主政权打仗。¹⁸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民主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并增加相互贸易时，和平的前景也随之得到改善。1950 年到 1985 年期间，当 3 个变量——民主、国际组织和贸易全都存在时，发生暴力冲突的概率减少了 72%。¹⁹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民主体制延伸到 117 个国家具有重大意义。除了限制各国彼此交战这一条理由外，还有另外两条理由。第一，由人民自由选出的政府比不是民选政府更讲道理，更关心人民的需求。第二，民主政府更有可能为捍卫人权和民主的全球准则采取集体行动。²⁰

泛区域论把世界设想成 3 个国家集团。欧盟在协调贸易、投资和成员国国内政策方面有着四十多年的经验，因此是 3 个集团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它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欧元），并渴望协调成员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1994 年 1 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该区域的贸易额 5 年内翻了一番。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投资也大幅增加。东亚没有类似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区域组织。但成立于 1967 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正是为了促进经济合作。现在有 10 个东南亚国家是它的成员。该地区的两大国——日本和中国——关系冷淡。因此，很难想象东亚地区会有一个自由贸易区。通过谈判建立这样一个贸易区更无可能。与此同时，日本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开始把东亚地区连成一片。

有人担心 以上 3 个泛区域可能会演变成为排他性的贸易集团。鉴于每一个泛区域内的主导大国离不开世界贸易，它们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3 个泛区域最关切的两个问题是：第一，通过协调政策加深一体化。第二，通过吸收外围的国家扩大自己的区域。欧盟同 12 个地中海国家签署了一项协议，在 2010 年底以前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它还为接纳中欧和东欧国家开始了无疑会是极其冗长困难的谈判。 1994 年 12 月，美国和西半球的其他 33 个国家一道誓言通过谈判，不迟于 2005 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最后，由 21 个国家组成的亚洲暨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同意最迟于 2020 年在太平洋两岸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以上定的期限颇为乐观。但由此可以看出，每一个区域内的国家均认为，自己的发展离不开贸易。而且每一个泛区域内的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它们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

以上的 5 种视角似乎想说明，由于文化的解体，全球的一体化，超越国家之上的管理和国与国之间的组合，国家主权急剧缩小。民族国家时代即将过时。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后即可看出，在每一种视角中，主权国家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许多持以上观点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例如，亨廷顿一方面称，文化变量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时又承认，“国家仍然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角。他在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的结尾设想的几种可能的冲突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²¹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超级市场正在取代超级大国。但他又说，由于全球化和敞开边境，主权国家在制定和执行规则上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无关紧要。“如果没有一个隐形拳头的话，市场这只隐形手永远也不会奏效……确保世界安全不致因硅谷的高科技受到威胁的这只隐形拳头就叫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

战队。”²²

民主和平论的基础是主权国家。泛区域同样由主权国家组成。每一个泛区域由一个国家主导。美国占北美总产值的将近 90% 和贸易额的 73%。在东亚的 9 个国家中，日本占该地区总产值的 70% 和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在欧盟的 15 个成员国中，德国占总产值的 23% 和贸易额的 28%。²³

19 世纪时，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比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微弱得多的政治思想。但所有这三种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于主权国家内。民族主义使一国获得能量和方向感。有时这是好事，有时却带来灾难。同样，20 世纪行将结束时，全球化、认同感、民主以及促进上述利益和思想的新成员（民间组织、跨国公司、政府间组织）正在重新决定主权国家的利益和偏好。²⁴

虽然政府间组织在越来越广泛的问题上变得日益重要，如欧洲委员会或世界贸易组织，它们的权力却源于主权国家缔结的协议。主权国家必须仔细权衡违反一项协议的代价，但它们始终保留了自卫的权利。主权国家参加区域组织是因为其领导人权衡了利弊，认为这样做利多弊少。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醒我们：“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效忠国家。”²⁵然而在一个经济增长依赖于贸易、投资和新技术的世界里，一体化是比闭关自守更好的自卫方式。

以上的 6 幅地图并不互相排斥。倘若它们是半透明的话，把它们叠放在一起可以对一个多维的世界作出更深刻的解释。例如，它们有助于我们弄清经济一体化与由此产生的文化效应之间的关系。为了解释亚洲金融危机蔓延的后果，或许可以从全球化中得到灵感，或是在每一个泛区域内和它们之间对比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评估联合国在处理卢旺达或波黑危机上的成败时，可以参照世界新秩序论点。

主权国家仍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过上述的每一种视角均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世界背景的认识。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主权国家为了自卫或促进自身的利益纵横捭阖。哪些国家才是最重要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弄清权力的涵义，然后找出拥有权力的国家。

权力与推行权力的国家

“权力”是一个涵义不清的词。约瑟夫·奈试着给这个词下定义时，把权力比作天气，聊起来容易，弄懂却很难。后来他又把权力比作恋爱，行易知难。²⁶如果按传统的军事标准把权力定义为打败敌人的能力的话，核武器就成了主要指标。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权力是指一国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更好的指标。世界上的三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

权力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起了变化。17至18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凡是能够征募到并养活最庞大的军队，拥有最多的纳税人的政府即可赢得战争。于是人们常常在权力和一国人口的多寡及可耕地的大小之间划等号。到了19世纪，工业和铁路成了比农业或领土大小更重要的权力资源。俄罗斯的人口超过德国，但却比德国弱，因为它缺乏后者的现代铁路和产业结构。

从最初的纺织业和产业革命开始，一直到化学、核技术和信息革命，凡是开发了一项新技术，或拥有一种新知识，或占有自己不可缺少的资源的国家即可称雄世界。英国凭借蒸汽机的发明和自己丰富的煤炭资源，率先开始了产业革命。此外，某些类型的国家更容易利用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例如，苏联利用中央计划经济的威力，发展了大规模的钢铁、化学和资本设备

工业。然而在电脑时代，它的指令性经济却成了绊脚石。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凭借武力攫取石油和煤炭。50 年后，它转而依赖市场和技术。这是因为日本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悟出，前者的代价要比后者昂贵得多，而且得不偿失。

当今流行的看法是，国家的权力来自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²⁷能缩短时间、距离或空间的技术就是权力的要素。因特网是最具威力的新技术，因为它能够用比现有的任何通讯手段更快、更廉价、更简便的方式向更多的人输送知识和信息。1988 年到 1998 年的 10 年里，因特网逐渐得到普及，从而刺激了整个一个产业。截至 1998 年，网上经济占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大约三分之一。²⁸

因特网和信息威力增加了个人和民间组织影响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能力。家住佛蒙特州的一位年轻妇女乔迪·威廉姆斯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她仅用了 6 年时间即通过因特网建立了一个由 60 个国家的 1300 个民间组织组成的联盟，起草了一项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地雷的国际公约。这些民间组织不顾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展开了广泛的游说。由于它们的努力，122 个国家的代表于 1997 年 12 月在渥太华签署了这项公约。威廉姆斯因发起了这次运动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位公共企业家利用一项新技术促进一项国际准则：它代表了新时代的一种新权力。

对何为权力的看法会影响对世界现状的认识，反之亦然。在一个实行自给自足和保护主义政策的世界里，土地是构成权力的一个要素。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土地变得不那么重要。诸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或日本这样的岛国可以很富强。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指出，随着世界从“领土国”过渡到“贸易国”，再过渡到信息和几乎一切生产要素都在流动的“虚拟国”，

权力的涵义也起了变化。²⁹

通常人们是从“硬权力”的角度去看待国家权力，如军队、人口、经济、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领土和自然资源。³⁰“硬权力”变量好就好在它们是可以衡量的，而且世界各国普遍把它们视为权力的指标。不过因此就匆忙断言，拥有大量硬权力的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未免过早。让我们先思考几个问题。首先，各种变量是可比的吗？中国的军队是日本的 10 倍，但它的经济规模只是日本的六分之一。这两个国家哪个更强大呢？其次，能把这些变量加权后合并，得出一个单一的权力指数吗？把人口与军费开支加在一起好比是把苹果与滚珠轴承混在一起。最后，决定需要多少硬权力才能迫使对手改弦易辙的“转换率”又是多少？罗伯特·达尔给权力下的定义是：有能力让别人做他自己不会主动做的事。³¹但这一常被引用的定义并没有解答以上的问题。不了解对手最初的偏好或改变政策的动机，就无从得知使用权力是否能一锤定音。汉斯·摩根索对探询动机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白费功夫”，造成了认识上的错误。³²计算这一“转换率”时，像民族主义这样的无形因素又如何处理呢？越南和阿富汗战争已证明，无形因素足以打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

奈把硬权力和“软权力”区分开来，从而从概念上改进了达尔的定义。根据他下的定义，“软权力”是“通过迂回或笼络的手段使他人产生与你同样的愿望”。³³软权力来自说服力或吸引力。德国人并没有强迫 19 世纪的智利或 20 世纪初的中国接受他们的军事顾问。智利和中国请德国派出军事顾问是因为这两国的领导人认为，德国陆军值得效法。

当然，软权力是无形的、无法衡量的。但有一些替代指标可以显示出一国的吸引力。日本的软权力来自于技术大国的名